

# 全民基本收入：西方国家“再平衡”的一个尝试

□ 赵 柯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弊病暴露无遗，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在民众中所引发的失望和愤怒情绪直接导致了民粹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兴起。如何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其恢复社会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成为了当前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带有“乌托邦”式的制度尝试重回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率先推出了试点项目。

## 全民基本收入兴起的原因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定期（例如每月）、定额的现金转移支付，以个人而非家庭为对象，无条件发给一国所有合法居民，没有经济状况审查，也不以是否工作为前提。这一政策主张在事实上为“不劳而获”提供了制度保障，极大地冲击了“有劳才有得”的固有观念。2016年6月5日瑞士就是否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进行公投，该项公投倡议要求每个成年人每月获得由国家无条件发放的2500瑞士法郎，儿童得到625瑞士法郎。当时这则消息被许多媒体当成一则搞笑甚至是娱乐新闻来看待。瑞士的公投最终被否决，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法定政治程序将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学术理念变为现实制度的尝试，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广泛讨论。

全民基本收入并非全新的理念，早在16世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就已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最低收入”概念，在此基础上，之后学术界也一直有关于对国民进行无条件转移支付的讨论。但全民基本收入真正从纯粹的学术象牙塔走向现实的政策实践，并且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和争论，与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密切相关。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M·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认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只是具有物质福利意义上的价值，它对一个社会的道德品行（moral character）——核心内容包括开放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度、社会流动性以及民主的质量——更是尤为重要。他在21世纪之初就曾警告，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回到二战结束后的30年以及1990



年代后半期那种快速和覆盖面广的增长，或者只能确保一部分人获益，那么社会的退化——悲观的社会氛围、种族和排外情绪的上升、民主政治的弱化——将不可避免。

弗里德曼的告诫在相当程度上正在应验。经济衰退使得西方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与财富的不平衡和阶层固化等问题更加凸显，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凝聚力，特别是侵蚀了青年人的信心 and 希望。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青年人（18—24岁）的收入呈下降趋势，虽然近几年收入随经济复苏得以恢复，但没有进一步增长。当前欧洲每四个青年人中就有一人面临贫困风险，即收入低于中位水平的60%，每五个青年人中就有一人仍在寻找工作。美国梦也在褪色，下一代会比父母一代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这是美国梦的核心。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子女的收入高于其父母的情况正逐渐消退。在1940年左右出生的群体，收入水平高于父母的比例大约为90%，而对于1980年左右出生的群体，这一比例仅有50%。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在今天进入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其背后所体现的恰恰就是在西方国家经济社会陷入困境的形势下，对社会公正问题的重新定义与再思考。

## 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实践

当前，全民基本收入不仅成为了一些国家的政策辩论议题，而且还进入到了一些国家的政策实践中。芬兰从2017年1月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从领取失业金、低保金的人群中抽签产生大约2000名25—58岁之间的芬兰公民，在接下来的24个月里，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无条件提供的每月560欧元基本收入，两年时间里他们将无法再获得失业金或

者低保金。不过，如果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找到了工作，每月560欧元的基本收入仍然可以继续领取。

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一直主张全民基本收入，在上台执政后提出了“国民基本收入”计划。2018年12月30日，包含国民基本收入计划的2019年预算案正式通过。根据法案，月收入低于780欧元的公民可以获得相应数额的“国民基本收入”，使月收入达到780欧元（例如，符合条件的月收入600欧元的申请者，将获得每月180欧元的补助）。该计划从2019年4月开始实施，获得“国民基本收入”最长不超过18个月，在到期一个月后可以再续18个月，预计将有约130万个家庭受益。意大利的国民基本收入计划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全民基本收入，因为其有经济状况审查、工作要求和诸多条件，但其与全民基本收入的核心理念已经很接近了。

荷兰从2017年开始在乌得勒支（Utrecht）等多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美国加州斯托克顿（Stockton）也在进行一项全民基本收入试验，在18个月期间为约100名斯托克顿居民无条件提供每月500美元现金，参与者必须居住在中等收入或低于城市中位数的社区，但对参与者的个人或家庭收入没有限制。

## 全民基本收入引发的思考

任何明智的社会制度，都需要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取得平衡。全民基本收入是国家以财政资金对每个国民，无论贫富、出身和职业，以现金的方式给予相同金额的转移支付。这一理念正从纯粹的学术探讨逐步转变为实际的政策实践，从中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正尝试由注重经济效率

转向注重社会均衡，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平等作为优先的价值理念，挑战了固有的劳动价值伦理，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下的“不劳而获”视为实现机会平等的必要保障和手段。第二，修正了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的观念。传统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公平多一点效率会损失，效率多一点会牺牲公平。而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则强调更加公平的社会才能让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第三，将社会团结置于公共政策的重心，全民基本收入的重要目标在于避免社会凝聚力因不平等导致的阶层分化和固化而受到侵蚀。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从理念到实践的发展历程，为深入观察西方国家在后危机时代的政策应对，提供了一个视角。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始终在劳动与资本、市场与民主以及自由与平等之间寻求平衡。西方政治领导人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吸取的教训是，社会发展可持续的平衡会被过度的市场行为所打破，因为民众不愿意接受一种把所有好处都交给精英、而把成本强加给穷人的市场模式。在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作出的回应是推出“新政”，试图用政府的力量驯服市场，不再把贫困仅仅视为是个人失败的结果，承认这也是社会经济制度失败的产物。观念的变化，使得罗斯福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与企业主谈判争取劳工权益。欧洲则是在1945年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开始建立“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推动“再平衡”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战后西方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到了1980年代，以“里根革命”“撒切尔革命”为标志，当时西方国家进行了第二次“再平衡”，方向是倾向于市场和效率，这开启了世界经济近30年的繁荣周期，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引发广泛争议和关注，其背后所体现地恰恰就是在西方遭遇经济社会危机和新技术引发生产关系变革的形势下，围绕新一轮“再平衡”问题所进行的利益调整和观念碰撞。



车间工件物流的跟踪和生产过程控制。多种型号产品共线生产的柔性化生产方式，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这就启示我们，制造模式加快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柔性制造、智能制造等日益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要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自动化装备及生产线应用，实现产品专业化、自动化、柔性流水式批量生产，大幅提升建造质量和效率。

注重标准制定，巩固领先优势。统一的标准是德国“工业4.0”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为了保障“工业4.0”的顺利实现，德国把标准化排在第一位，在“工业4.0”平台下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处理标准化问题，以巩固和提升行业领先优势。“工业4.0”认为，实现目标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一个人、机器、资源互联

（上接1版头条）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兴起，就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前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近百年党的建设洗礼，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各种锤炼，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规矩体系，保证了这个党在严格有序的范围内活动，也保证了这个世界第一大政党在治党、治国方面能够稳步地走向成功。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建党、治党，建国、治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经验，那就是不断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一方面，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深刻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正是这种核心领导地位和核心领导力量，领导人民进一步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

### （上接1版二条）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非公有制经济是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出了一系列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等等。

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形成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另一方面，坚定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事业成功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从我们党的发展历程、领导经验和领导体制来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而强化核心意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又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核心领导体制极为重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有一个核心，拥有一个人民爱戴的领袖、全党拥护的核心，是事业成功的可靠保证，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可靠保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维护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 （上接1版二条）

政策体系，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关键是狠抓落实，将政策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针对一些政策配套措施还不是很实、政策落地效果还不是很好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而言，所谓“亲”，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所谓“清”，就是要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改善营商环境离不开久久为功，将清廉内化在干部与企业家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理想中法治化的政商关系，既不是勾肩搭背，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合理的监督机制下“相敬如宾”，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坦坦荡荡在桌面上讨论问题、解决困难、办成事情。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 德国是如何让『工业4.0』落地生根的

□ 高 婷

德国“工业4.0”是德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高科技战略计划，是德国高科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德国引领新的产业变革的关键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为了让这一战略计划落地落实，2015年，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发起“‘工业4.0’：从科研到企业落地”计划，旨在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工业4.0”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有效推动了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

关注数字融合，探索产业升级。数字化是实现“工业4.0”的基础条件。只有数字化进程得到推进，未来生产网络才能得以建立。德国“工业4.0”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来改变当前的工业生产与服务模式，既能使生产和交付更加灵活，又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人才结构。德国企业善于紧跟新技术，通过对新技术新趋势的跟进，确定下一步产品方向，确定企业战略目标，由此发展出大量中小企业“隐形冠军”。这些企业通过建立健全知识和技术转化机制，加速创新成果的商业化。通过广泛应用嵌入式软件，使产品具有记忆、感知、计算等功能。通过产品的智能化，大幅度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互联网掌握已售产品在客户的运行状态，帮助客户更好地运用产品，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并进行预防性维护。同时，还可以通过这个

系统采集产品运行过程的大数据，辅助产品进行进一步升级换代、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市场经营行为的决策。这就启示我们，在传统工业企业升级过程中，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获得和利用信息，科学决策，应用智能设备，合理整合、配置企业内外资源，更好地满足和引导用户需求。通过加快推动技术创新，加强产融结合，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打造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推进智能制造，强化柔性生产。智能制造是“工业4.0”的核心。通过嵌入式的处理器、存储器、传感器和通信模块，把设备、产品、原材料、软件联系在一起，使得产品和不同的生产设备能够互联互通并交换命令。未来工厂能够自行优化并控制生产过程。更进一步，除了产品和机器的互联外，“工业4.0”还将在未来实现工厂、消费者、产品、信息数据的互联，最终实现万物互联，从而重构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业4.0”的本质是以万物互联为基础，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相关的技术来改变既往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增强柔性化生产，同时将传统工厂关注制造环节向前端的设计环节以及后端的服务环节延伸。自动化和信息化是实现柔性定制个性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根据生产计划，企业将各种生产所需信息提前写入客户端，生产过程中再将相应工序所需要的相关生产信息读取出来，进行生产操作，从而实现对整个

